

降低税负与缓解贸易摩擦： 基于 CGE 模型的分析

邓力平¹，战岐林²

(1.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福建厦门 361005; 2.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在研究我国因贸易顺差过大引起的贸易摩擦时，我们注意到了其中涉及的国内税收因素，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发现，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的降低对减少顺差有显著作用，而企业所得税变动对外贸顺差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降低税负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从而缓解贸易摩擦，特别是通过降低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来加以实现，而企业所得税实际水平可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

【关键词】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贸易摩擦；减税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701(2011)06-0003-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加入WTO十年以来，贸易摩擦更是有增无减，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关系都带来了负面影响。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不少学者进行了多角度与多层次的分析。

在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方面，王亚飞(2009)认为在大国兴起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形成战略性贸易摩擦。^[1]张亚珍(2009)将欧盟区分为若干经济板块，分析了各板块在中欧贸易摩擦中的表现和作用，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不同应对方略。^[2]吴郁秋等(2009)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不同需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效用最大

化而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供给，从而形成了制度与产品层面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诱发机制。^[3]柳剑平等(2009)发现在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低的产业中，由于其进行结构调整的成本较大，减少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得，更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可以缓解贸易摩擦。^[4]何琼隽(2009)分析了“大国假设”等条件下的多重均衡结果及所致的利益分配冲突，强调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都是国家间利益分配冲突的表现形式。^[5]王勇(2010)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认为摩擦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推行的国家战略和贸易战略。^[6]李淑俊(2010)认为国际与国内力量的合力促成了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导致了美国产业借用气候变化名义申诉中国产品的不公平贸易。^[7]荆林波(2010)强调了国际经济环境、贸易救济的政治特性以及碳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成因。^[8]尤宏兵(2010)分

【收稿日期】 2011-10-17

【作者简介】 1. 邓力平(1954-)，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经贸与财政税收；2. 战岐林(1981-)，男，辽宁铁岭人，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税收。

析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从国际环境和我国国内因素等方面归纳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9]黎慈(2010)以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四个原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政治运作机制、中美间的巨额顺差和中国外贸依赖型经济的缺陷。^[10]黄晓凤(2010)认为传统要素驱动贸易模式存在着内生摩擦因素,而技术驱动贸易模式创造了新型贸易的双赢。因此,化解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方法就是要加速科学技术的扩散并建立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机制,从而实现贸易模式从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的转型。^[11]

而在以定量分析与建模为主的研究方面,朱彤等(2008)利用演化博弈理论中的复制动态方法,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与贸易摩擦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贸易政策的形成是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12]邝艳湘(2010)基于中美两国间经贸关系的现实,构建了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而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两国间发生低级别贸易摩擦事件的概率增加,但低级别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概率下降。^[13]胡方(2010a, 2010b)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探讨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各国进行贸易利益分配的基本形式以及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并进行了实证分析。^{[14][15]}该系列文章还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贸易产品种类的增加及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汪伟(2010)通过构建博弈与谈判模型分析了国际比较利益的分割以及各国贸易模式的选择,并据此解释了国际贸易得益的分配及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16]

笔者多年来同样关注我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研究侧面就是对我国贸易摩擦中涉税(主要是境内税)因素的考察。邓力平(2006)指出,贸易对手国之间税制特征上的差异与税收政策上的有争议运用已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16]我国遭遇的众多贸易保护案包含着贸易对手国对我国财税制度与税收政策的质疑,如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的某些财政补贴等。

此外,我国外贸顺差居高不下,除了要素禀赋等经济优势原因外,也有地方政府财税支持措施的作用。邓力平(2008)结合我国现实,将贸易摩擦区分为两类,一是成本等经贸因素导致的纠纷,二是因财税体制特征及财税政策运用而产生的摩擦,并以出口退税和资源税两个方面对后一类摩擦加以论证。^[18]邓力平等(2011)则分析了十年来 WTO 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指出 WTO 框架内的涉税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WTO 规则与一国税法的冲突是税收与贸易关系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全球化下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冲突的产物, WTO 下涉税贸易冲突的增加是一种正常趋势。^[19]

对于涉税贸易摩擦,可以就某一特定案件中的涉税因素进行剖析,也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加以把握。本文属于后者,力图对我国贸易摩擦中的涉税因素进行量化分析,首先构建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而后依此对税收因素对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贸易顺差)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从以结构性减税为特征的税制改革角度对缓解我国贸易摩擦提出政策建议。

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等都是主体税种,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税收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都很难确定。为此笔者构建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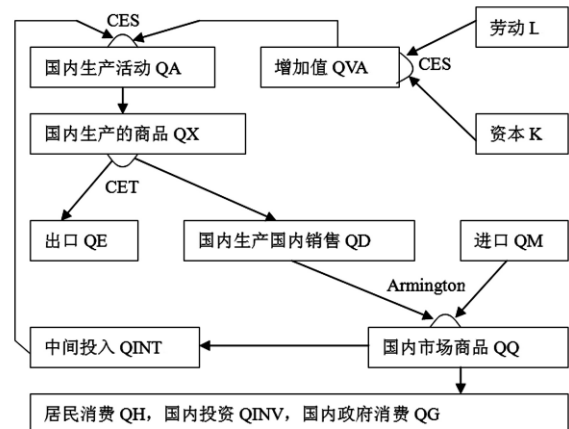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的模拟分析,以期得到系统的分析结论。该模型主要包括账户选择、函数形式选择、参数确定和闭合规则设定等四个部分(图1)。

在图1所示模型结构示意图的基础上,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研究需要,将生产活动和商品区分为42类,将居民区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类。QA生产的弹性参数仿照Zhai et al. (2005)的做法,全部设定为0.1;QVA生产函数、Armington函数和CET函数的弹性值选用了郑玉歆(1999)、谢杰(2008)、贺菊煌(2002)和Zhai et al. (2005)的研究成果(表1)。

表1 CGE模型函数弹性值

部门	QVA	Arm	CET
Sec1	0.63	3.16	4.05
Sec2	0.77	3.1	4.6
Sec3	1.79	7.4	4.6
Sec4	0.62	3	4.6
Sec5	0.62	2.55	4.6
Sec6	0.72	2.1	4.62
Sec7	1.07	3.8	5.4
Sec8	0.89	3.9	5.2
Sec9	0.99	3.4	4.6
sec10	1.18	3	4.6
sec11	1.59	2.1	3.8
sec12	0.87	3.3	3.8
sec13	0.89	4.2	4.6
sec14	0.97	3	4.6
Sec15	0.90	3.8	4.6
Sec16	1.03	2.8	4.6
Sec17	0.22	3.55	4.6
Sec18	0.53	4.1	4.6
Sec19	0.89	4.4	4.6
Sec20	0.91	4.1	4.6
Sec21	0.89	3.8	3.8
Sec22	0.89	3.8	3.8
Sec23	0.52	0.9	0.5
Sec24	1.02	0.9	0.5
Sec25	0.88	0.9	0.5
Sec26	1.75	1.9	3.8
Sec27	0.39	1.9	2.8
Sec28	0.39	1.9	2.8
sec29	0.39	1.9	2.8
sec30	0.39	0.5	2.8
sec31	0.39	1.9	2.8
sec32	0.39	1.9	2.8
sec33	0.39	0.5	0.5
sec34	0.39	2.8	3.8
sec35	0.39	2.8	3.8
sec36	0.39	0.5	0.5
sec37	0.39	0.5	0.5
sec38	0.39	1.9	2.8
sec39	0.39	1.9	2.8
sec40	0.39	1.9	2.8
sec41	0.39	1.9	2.8
sec42	0.39	1.9	2.8

笔者在凯恩斯闭合规则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假定资本存量有限。社会核算矩阵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我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第四象限的数据取自财政年鉴和资金流量表。关税数据的计算中用到了42种产品的进口税率,笔者根据中国关税目录计算了平均税率,并结合财政年鉴中的关税收入计算得到了进口关税金额。

三、税收因素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模拟分析

模拟分析中将进出口状况和外贸余额作为观测变量,是因为我国外贸摩擦一般都与外贸余额相伴随。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种种声音,大都是以我国外贸顺差过大为口实的。现有文献中将贸易摩擦归结为国际利益分配或者大国崛起影响世界格局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结到贸易顺差上来,因为最终利益分配是通过国际贸易来进行的,而经常账户余额则是最终状况的重要体现。如果中国外贸收支结构得到改善,可以预期贸易摩擦将会相应减少。

运用本文所构建的CGE模型,笔者就各税种变化对于外贸的影响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而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表2中除了42部门总额变动情况之外,还选择了金额下降最大的五个部门,之所以选择金额而非比例,是因为有些部门为非贸易部门,基数为0,即便随机扰动造成的微小变动,也会得到很大的变动比率,但其现实意义却很小;金额大的变动则会对外贸总体平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

其一,增值税变动影响分析。增值税作为间接税,因为转嫁税负而影响价格水平、工资水平和消费倾向的因素客观存在,但税负能否转嫁或转嫁多少受到了商品供求弹性的制约。因此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增值税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对外贸的积极作用或消极影响都可能存在。在简单的静态局部均衡中,假定产品市场完全竞争,企业受零利润条件的约束,生产技术和投入要素价格不变,则税负向前转嫁,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国产品价格

表 2 各税种平均税率下降 10% 对中国外贸的影响

	部门	下降金额			下降比率		
		出口	进口	余额	出口	进口	余额
增值税	合计	-721.19	-393.77	-327.42	-0.08	-0.05	-0.15
	纺织业	-102.04	-7.45	-94.60	-0.12	-0.09	-0.13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71.37	-5.44	-65.93	-0.13	-0.09	-0.13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88.54	-133.33	-55.21	-0.09	-0.08	-0.1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5.16	-25.15	-30.00	-0.08	-0.07	-0.09
	金属制品业	-29.51	-4.10	-25.42	-0.08	-0.07	-0.09
营业税	合计	-185.84	-86.43	-96.75	-0.02	-0.01	-0.04
	批发和零售业	-20.24	0.00	-20.24	-0.05		-0.05
	纺织业	-19.83	-1.44	-18.39	-0.02	-0.02	-0.0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7.78	-33.72	-14.06	-0.02	-0.02	-0.03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13.88	-1.05	-12.83	-0.02	-0.02	-0.03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8.42	-1.51	-6.91	-0.02	-0.01	-0.02
个人所得税	合计	1.96	372.25	-366.76	0.00	0.05	-0.1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24	82.21	-81.97	0.00	0.05	-0.16
	化学工业	0.05	45.61	-45.56	0.00	0.05	0.24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0	35.24	-35.24	0.00	0.05	0.2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	28.84	-28.84	0.00	0.05	0.05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0	21.60	-21.60	0.00	0.05	-0.26
企业所得税	合计	0.00	0.00	2.69	0.00	0.00	0.00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金属矿采选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废品废料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的降低和竞争力的增强,出口会增加,进口会减少。另一方面减税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增加进口,减少出口。具体的变化情况取决于两者变化的强度对比。模拟结果表明,进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出口下降得更多,外贸余额下降了 3274.2 亿元。顺差降低了 15%,这说明上述两方面的传导机制都发挥了作用。

从行业来看,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业两个产业的出口受增值税下降的影响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出口退税制度的存在。通过出口退税,出口部门比非出口部门享受了成本优势,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出口部门的集中。增值税率降低,相当于降低了对出口部门补贴的幅度,生产要素向该部门的集中程度也相应下降。一般来说,资源禀赋增长会带来密集使用该要素产品出口绝对额的增加,也会带来非密集使用该禀

赋产品的出口绝对额的减少。税收扭曲减少后,生产要素从出口部门的流出相当于减少了出口部门的要素,增加了其他部门的要素供给。

其二,营业税负下降影响的分析。这里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顺差。模拟结果显示,与增值税的影响相似,营业税的下降也减少了中国外贸余额。进口的下降主要源于税负下降带来的价格优势,国产品替代了进口品;出口的下降则来源于税负下降带来的国民收入的提高,国内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厂商增加对本国市场的供给,减少了出口。二是影响幅度较小。增值税下降 10%,导致了出口下降 7.5%,进口下降 5%,顺差减少了 15%;营业税下降 10%造成的出口、进口和顺差的下降分别为 2%、1.2%和 4.6%,大大小于增值税的影响。从营业税所影响的行业来看,服务业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商品贸易额,因此其竞争力变化对外贸总体的影

响也较小;从营业税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看,其份额远不及增值税,因此,通过国民收入途径影响的出口额下降的幅度也小于增值税变化的影响。三是营业税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较为显著。营业税的课税对象主要在第三产业,因而对外贸的影响也偏向于第三产业,受到影响最大的五个产业中有两个属于第三产业,而增值税下降影响最大的五个产业全为制造业。

其三,个人所得税负下降的影响分析。该税属于直接税,较难转嫁,经济影响比较明确。给定工资率,如果产出和就业没有下降,则个人所得税的下降会带来居民总收入提高和国内需求增加。部分需求增加会用于增加进口,则个人所得税的下降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总需求的增长可能带动物价上涨,从而增加企业的名义收入、降低实际工资水平,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出口也可能增加。模拟结果显示,个人所得税负下降对出口的影响较小,只有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这两个部门的增长幅度为0.1%,其他部门受影响程度均小于0.1%。但是进口增加较多,多数部门都有5%的增长,使得贸易顺差减少了17%。这表明在前述两种效应中,居民收入增加而带动需求上涨和进口增加的效应占主导地位。从具体行业上看,受影响最大的几个部门也是中国进口额最高的部门,第二、第三、第四个行业都是逆差部门,而这正是收入增加与进口扩大的路径。

其四,企业所得税调整的影响。该税的计税依据是企业的利润额,与个人所得税相似,同

属较难进行税负转嫁的税种,不同之处在于,企业所得税若有减少,则节省的开支或增加盈余公积或用于投资。盈余公积的分配最终也会转化为国内的购买力,但如果考虑到高收入人群较低的消费倾向,则消费增加可能有限。投资的增加则会增加对中间投入的需求,从对投入产出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投资增加也会产生扩大国内需求的作用。如果考虑到市场结构为接近完全竞争的情况,企业的超额利润终将消失,则税收的降低会转化为产出成本下降(相当于使用政府服务的成本下降),产品价格的下降则会带来出口竞争力的增强和出口额的增加。模拟结果中显示,企业所得税的下降对外贸影响并不突出,导致出口下降了 5.628×10^{-9} ,进口增加了0.01%,总体的贸易顺差仅减少了0.03%。

由于CGE模型包含大量非线性方程,其参数除少数用计量经济方法或采用其他文献研究结果外生给定外,大部分参数是通过校准法标定的。校准法主要以SAM为依据,SAM的特性使得由校准法得出的参数不具有统计意义,不能得到对参数可靠程度的度量。因此,需要检验在弹性值等自由参数偏离取值点的情况下,所研究的变量是否稳健,这就是稳健性或敏感性分析。表3列出了模拟结果的变动情况,其中的“出口变化1”表示全部弹性系数增加5%之后的模拟结果,“出口变化2”表示全部弹性系数减少5%之后的模拟结果,进口和余额指标的含义亦如是。从表中可以看出,各项弹性系数变化都没有影响本文已经得出的结论。

表3 弹性系数变动5%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增值税下降10%	营业税下降10%	个人所得税下降10%	企业所得税下降10%
出口变化1	-0.09131	-0.02328	0.000204	6.23E-07
进口变化1	-0.06279	-0.01352	0.0119352	8.79E-07
余额变化1	-0.19076	-0.05816	-0.07585	-0.00125
出口变化2	-0.06386	-0.01663	0.000204	-1.3E-08
进口变化2	-0.04606	-0.01025	0.001194	-1.6E-08
余额变化2	-0.12617	-0.03977	-0.00757	-0.00125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是从宏观层面上模拟分析我国现有主要境内税种变动对贸易顺差可能的影响,从而通过贸易顺差与贸易摩擦的关联性来潜在地量化把握贸易摩擦中的涉税因素变化的作用,或者说隐含着税负变动(下降)对减少贸易顺差与缓解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

计量模型分析从来只是对现实的模拟归纳,而且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简单地依据某一模型的结果来单独地做出任何政策的判定,本研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模拟的结果毕竟是对现实的抽象,是对现实存在的揭示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因此,我们依然可以据此探讨税负调整对贸易顺差的可能影响。总体上看,本研究对税负变动影响的基本判断及其政策启示主要有三。

其一,降低税负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特征。在税制改革的众多目标中,本研究倾向表明,降低贸易顺差进而缓解贸易摩擦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降低税负在促进企业发展、提高竞争力、增加市场基础性配置作用等方面都会产生作用,而增加了缓解贸易摩擦这样一个同向的政策目标,则我们对降低税负的政策决心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例如,模拟显示,个人所得税负若下降 10% 则会带来外贸顺差减少 17%,其政策启示显而易见。当前我国税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负,无论是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还是减少税率档次,主要都是服务于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平这一目标的,而本文研究又为此改革增加了一项内在的促进因素。

其二,认真研究特定税种减负对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在总体降低税负过程中,有些税种对于缓解贸易摩擦的贡献度会大些,这就启示我们在未来税制调整中对税种选择能有所考虑。例如,模拟显示,增值税下降 10% 会带来外贸顺差减少 15%。增值税下降对中国出口优势集中的部门有显著的影响。营业税下降 10% 会带来外贸顺差减少 4.5%。营业税虽然也对外

贸余额产生负向影响,但作用小于增值税。因此,当前讨论的增值税扩大到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增值税扩容与营业税的相应调减,就不仅有了原来设置中的调整结构、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政策目标,还可以通过这两个税种的调整来达到缓解贸易摩擦的目标。

其三,认真研究降低税负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在总体降低税负过程中,还有一个结构调整问题,既包括降低税负的“收入中性”考虑,也包括对某些税种所占比重的调整。例如,模拟显示,企业所得税下降 10% 会带来外贸顺差减少 0.034%,增加 10% 会带来外贸顺差增加 0.221%。这表明相对应于其他税种,企业所得税变动对外贸余额影响较小,因而对缓解贸易摩擦这一目标的作用相对较小。从一定意义上说,结合其他税种变化情况的影响,可以适当考虑用企业所得税来弥补因其他税种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这里强调的并不是该税种总体税负的“提高”,只是说因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目前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一些垄断性行业存在着较高的利润率,而一些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微薄。从所有制上看,国有企业利润率较高,而民营企业利润率偏低。在实施国家统一的所得税率条件下,出现这种偏差的原因可能在于征税过程中的不规范和税制上的不完善。因此,这里讲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变动,主要指的是在结构性减税的前提下加强对垄断与大型企业的税收征管。

参考文献:

- [1] 王亚飞.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J]. 当代财经, 2009 (3).
- [2] 张亚珍. 基于欧盟板块经济特征的中欧贸易摩擦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4).
- [3] 吴郁秋, 刘海云. 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与贸易摩擦诱发机制:基于利益集团视角的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5).
- [4] 柳剑平, 张兴泉. 产业内贸易:调整成本与中美贸易摩擦[J]. 经济评论, 2009 (4).
- [5] 何琼隽. 从贸易摩擦到汇率系统的国家利益冲突[J]. 财经科学, 2009 (6).
- [6] 王勇. 辩证对待美中贸易摩擦和施压人民币升值问题[J]. 国际贸易, 2010 (4).

- [7] 李淑俊. 气候变化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7).
- [8] 荆林波. 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现状: 成因、趋势与对策[J]. 财贸经济 2010 (12).
- [9] 尤宏兵.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再透视[J]. 经济问题探索 2010 (3).
- [10] 黎慈. 金融危机下的中美贸易摩擦与政府的有效应对[J]. 经济与管理 2010 (3).
- [11] 黄晓凤. 贸易模式的转型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化解[J]. 国际经贸探索 2010 (3).
- [12] 朱彤 李磊. 利益分配、公共选择与贸易摩擦: 演化博弈的视角[J]. 国际经贸探索 2008 (6).
- [13] 邝艳湘. 经济相互依赖与中美贸易摩擦: 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 (11).
- [14] 胡方. 贸易自由化与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分析[J]. 中国经济问题 2010 (5).
- [15] 胡方. 产品种数、寡头竞争与国际贸易摩擦[J]. 世界经济研究 2010 (6).
- [16] 汪伟. 微观基础的李嘉图模型及其比较利益分配: 兼论中美贸易摩擦[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 (9).
- [17] 邓力平. 加快税制改革、应对贸易摩擦[J]. 涉外税务 2006 (3).
- [18] 邓力平. 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建设[J]. 山东经济 2008 (3).
- [19] 邓力平, 罗秦. 税收发展与税制改革: 加入 WTO 十年后的思考[J]. 税务研究 2011 (5).

Reduce Domestic Tax Burden in China and Alleviate Trade Friction: Analysis Based on CGE Model

DENG Li-ping¹, ZHAN Qi-lin²

(1.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2. City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While studying the issue of trade friction caused by trade surplus in China, the author takes notice of the domestic tax element and uses CGE mode for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s when value added tax (VAT), business tax and personal income tax reduce, the surpluses decrease as well, while the chang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has a relative slight impact on trade surpluses. Therefore, reducing average tax rates of VAT, business tax and personal income tax will help to reduce trade surpluses, alleviate trade friction, and enterprise income tax should be structurally adjusted.

Key words: CGE model; trade friction; tax cut